

WODEZHIXUEZHIDAO

我的治学之道

萧宗六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95
Z01192294

谨以此书

献给我国中小学校长和教师

ISBN 7-107-18481-4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7 107 18481 4

WODEZHIXUEZHIDAO

我的治学之道

萧宗六 著

100009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治学之道/萧宗六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ISBN 7-107-18481-4

I. 我...

II. 萧...

III. 教育科学-科学研究

IV. 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6860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1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12.00 元

80
80
80
80



八十回首

- 《我的治学之道》序 (1)
- 我写“治学之道”的理由 (6)
- 治学之道与治校之道 (9)
- 一次难得的机遇 (12)
- 把同行朋友组织起来 (14)
- 拿起笔来之箭 (17)
- 写自己熟悉的事 (20)
- 对教育方针提出质疑 (23)
- 《教育方针质疑》引发的大讨论 (27)
- 再次质疑教育方针 (32)
- 我国现行教育方针是怎样出台的 (37)
- 对中小学领导体制提出质疑 (41)
- 体制改革无坦途 (45)
- “教授说的不算” (49)
- 对教学原则提出质疑 (53)
- 对“素质教育”提出质疑 (56)
- 一位小学校长质疑素质教育 (61)
- 记一次“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 (66)
- 对“培养非智力因素”提出质疑 (71)
- 对贵族学校提出质疑 (75)
- 第三个“凡是”也应抛弃 (78)

质疑促我读书	(82)
写质疑文章要破“三怕”	(87)
新任校长怎样才有威信	(91)
看“警告处分”有感	(95)
学习的诀窍	(98)
“曾经沧海难为水”	(101)
高尔基语录引发的联想	(104)
《鲁迅日记》读后	(107)
怀念教育家刘佛年教授	(111)
怀念语言学家朱伯石教授	(115)
为筹建湖北省老教授协会呐喊	(119)
高中三年杂忆	(125)
一道高考作文题引发的联想	(131)
翻天覆地的变化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137)
请珍惜教师的光荣称号	
——第十九个教师节感言	(141)
“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由来	(145)
老有所为，有所不为	(147)
立志写三本书	(150)
两分钟讲话	(156)
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	(159)
附 录	
教育改革不等于喊口号	
——访全国教育管理学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萧宗六教授	
..... 徐 燕	(173)

学者的真精神

——读萧宗六先生学术论集《教育管理研究》有感

..... 别敦荣 (178)

我不赞成“培养非智力因素”的说法

——答《中小学管理》杂志问..... (182)

“素质教育”再质疑..... (190)

《学校管理学》自序..... (199)

《教育管理研究》自序..... (204)

《教育管理研究》后记..... (209)




八十回首

——《我的治学之道》序

“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岁曰期颐。”幼年时私塾先生教我读《幼学故事琼林》，至今还记得这几句话。从2004年10月起，我跨入耄岁之年。回首八十，大约经过三个阶段：一是求学阶段（1949年以前），可说是战乱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正是我念小学、中学、大学时期，饱受战乱之苦。二是工作阶段（1950年至“四人帮”被粉碎），可说是阶级斗争年代。从1950年起，我在中学当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境内虽然没有战争，但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人们尝够了政治斗争之苦。三是一边工作、一边做学问阶段（1979年至现在），也就是改革开放年代。1979年春，我由中学调入大学工作，真正的工作和做学问是在这个阶段。

进入第三阶段，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教中学和教大学大不相同，对象不同，专业不同，一切得从头来。我不仅有行政工作，也有教学、科研任务，还有学会工作（我长期担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和全国教育管理学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我拼命去适应，一晃就过了花甲之年。好在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离休以后，返聘了八年，主要是带研究生，从事教育科研活动。我的所谓科研成果，大部分是在离休以后取得的。

文科教师，所谓科研成果，无非是写文章，著书立说。



将近30年的中学工作经历，为我从事教育科研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1979年到现在，我发表了150多篇论文。我写的这些文章，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的，没有空谈理论，没有无病呻吟。

我为什么写《我的治学之道》，已在第一篇文章《我写治学之道的缘由》中作了说明。当时已写了28篇短文。这些短文，先后在《中小学管理》和《湖北教育》连载，颇受读者欢迎。有些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建议我继续写下去，我也觉得言犹未尽。近几年身体不太好，眼睛多次动手术，视力很差。但“继续写下去”的呼声一直鼓励着我，于是我又拿起笔来，增写了12篇，共40篇。

40篇文章，有不少是质疑文章，例如对教育方针质疑、对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质疑、对办贵族学校质疑、对苏联提出的教学原则质疑、对“培养非智力因素”质疑、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质疑、对“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质疑，等等。质疑文章，是《我的治学之道》的主要内容。

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最近从电视中看到五四运动的先驱、大学问家胡适先生的一副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我很赞赏这两句话。做学问，只有“在不疑处有疑”，才能深入发现问题，才能提出新观点、新见解，才能推翻旧的或不科学的说法。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

做学问，要善于联想。见到一张布告，看到一则名人语录，读了一本名人传记或日记，想起过去的一道高考作文题，我都可以联想起一些人和事，作为治学内容。本书中的《看“警告处分”有感》、《学习的诀窍》、《高尔基语录引发的联想》、《〈鲁迅日记〉读后》、《一道高考作文题引发的联想》等

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做学问，要勇于求教。向有专长的人求教，向自己的学生求教，向书本求教。有的典故我未弄清，就向国学基础深厚的学者求教；我不懂“劳动”一词在俄语中的含义，就向我的学生、一位俄语专家求教；为了弄清智力与非智力问题，我向心理学专家求教；为了弄懂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无为”哲学思想，我查阅了好几本有关老子的书。本书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高尔基语录引发的联想》、《对“培养非智力因素”提出质疑》等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做学问，要敢讲真话，不说大话、空话、套话。人云亦云，老生常谈，只能使人昏昏欲睡，甚至令人生厌。本书最后两篇文章《两分半钟的讲话》和《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回顾了我二十多年来在哪些方面力求这样做。

如果说我在治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参考之处，就是上面所说的几点：敢于质疑，善于联想，勇于求教，敢讲真话。

本书有些文章并未涉及治学之道，但与治学多少有点关系，如《怀念教育家刘佛年教授》、《怀念语言学家朱伯石教授》。这两位先生的治学风格与治学精神，很值得我学习，也值得青年学子学习。

我是两个学术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一个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一个是湖北省老教授协会。为筹建这两个学会，我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不少人做学问提供了机会。本书中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把同行朋友组织起来》和《为筹建湖北省老教授协会呐喊》，叙述了筹建学会的艰苦历程。

有的文章与治学没有多大关系，如《高中三年杂忆》、《请珍惜教师的光荣称号——第十九个教师节感言》，但却记



录了两件千万不要忘记的大事。《高中三年杂忆》记录了1945年我亲眼目睹日寇的暴行,《请珍惜教师的光荣称号——第十九个教师节感言》记录了“文革”期间我亲身经历的那场浩劫的痛苦。虽然着墨不多,但我把它作为历史记载下来了。我认为,外来的侵略和“文革”的内乱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是千万不要忘记的,是永远不要忘记的。应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毋忘国耻!毋忘“文革”!只有不忘国耻,不忘“文革”的惨痛教训,富国强兵才有动力。

本书附录了七篇文章:一篇访谈录,一篇书评,两篇与本书内容有关的文章,三篇自序与后记。这几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的治学态度。

《我的治学之道》大概是我最后一本书。有人说,“人定胜天”,这话有时是对的;但“天命难违”,则永远是对的。所谓“天命”,就是自然规律,或叫自然法则。我在花甲之年、古稀之年时,还有一番“雄心壮志”。我在出版第一本论文集《教育管理研究》的“后记”中说过:“教育管理难题多,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跨入80岁,我就不敢说了,连想也不敢想了,因为我不可能“上下求索”了。为什么?天命难违。脑子不大管用了,视力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自然规律。但我并不悲观,我在73岁以后,眼睛四次动手术,还患有脑梗塞病。一位好心的朋友劝我做到“六不”,才有望延长生命:不看书,不看报,不看电视,不写作,不去外面讲学,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想,真正按“六不”去做,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岂不成了一个废物?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说不定很快就会患老年痴呆症!我没有听他的劝告,尽可能做到老有所为。2004年春,我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先进老人标兵,随后又被评为湖北省先进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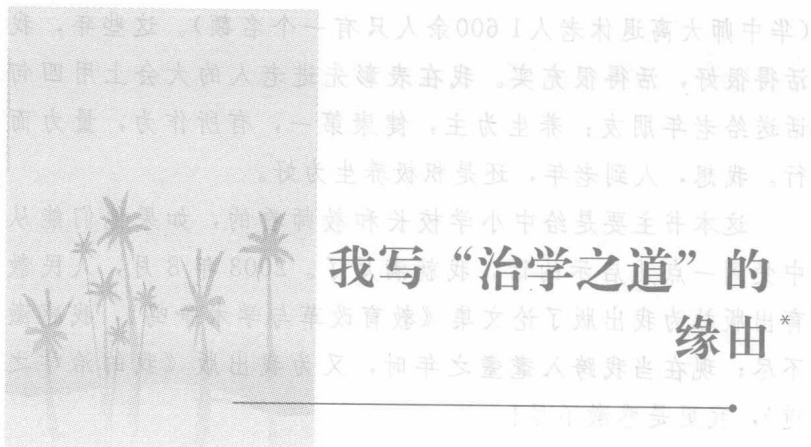
(华中师大离退休老人1600余人只有一个名额)。这些年，我活得很好，活得很充实。我在表彰先进老人的大会上用四句话送给老年朋友：养生为主，健康第一，有所作为，量力而行。我想，人到老年，还是积极养生为好。

这本书主要是给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看的，如果他们能从中受到一点儿启示的话，我就满足了。2003年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论文集《教育改革与学术争鸣》，我感激不尽；现在当我跨入耄耋之年时，又为我出版《我的治学之道》，我更是感激不尽！

萧宗六

2004年10月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





我写“治学之道”的 缘由*

2000年1月，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教育管理研究》。论文集里的文章，都是已经发表过的。一般说来，销路有限，无利可图，出版社是不愿出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个出版社不想赚钱？出乎我的意料，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过我出示的目录后，即决定出版。他们表示，即使亏本，也在所不惜，且一印就是4000册。当时我担心销不出去，辜负了出版社的一片好意，便索取了一部分征订单，寄给同行朋友。2001年春，我问出版

* 《我的治学之道》写于2001年4月至2002年6月，共28篇短文。从2002年1月起，《中小学管理》杂志连载，并配发了编者按：萧宗六先生是我国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泰斗之一。他在学术上的诸多建树对教育管理研究乃至教育决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的治学之道》系列文章，是萧老对几十年“怎么做学问”的体会和总结。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较之治校之法，治学之道更有普遍意义；较之学术理论，治学之道更有长期价值。

《我的治学之道》28篇短文在《中小学管理》和《湖北教育》连载后，读者反映很好，建议我继续写下去，又增写了12篇，共40篇。另外附录了与治学有关的7篇文章，即现在出版的《我的治学之道》。——著者注




社还有多少存书，答曰：已基本上售完。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出版社为什么这么痛快同意出版？原来我那本集子里有不少学术争鸣文章，特别是对教育方针、校长负责制、非智力因素和素质教育等问题的争鸣，在教育理论界有一定影响。文章公开评论了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顾明远、上海师大教授燕国材等人的文章或学术见解，张、顾、燕也写了反批评文章（附录于书中）。出版社认为，这样的书不会没有人买。

论文集出版后仅两个月，《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作了报道，标题是：《萧宗六“质疑教育”出了书》。报道说：“最近，被称做‘质疑专家’的萧宗六教授，将自己几十年质疑教育的争鸣文章结集成《教育管理研究》，交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大概是见到这则报道，有些读者来信或来电询问购书的有关事宜，有的则询问那些争鸣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不可能一一回信，也不可能信中把问题说清楚。此事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读者提出的问题是治学问题，即怎么做学问的问题。如果把有些争鸣文章的写作动机、写作过程写出来，对青年校长怎么做学问也许有点儿启发作用。我忽然想到一个题目：我的治学之道。我设想，把我的读书、写作、质疑、求教、学术活动等写成系列文章，分为若干小题，每篇一两千字（只谈一个问题）；把当时的原始想法，如实地和盘托出，读者也许会感兴趣。

2000年，是我从事教育工作50周年。50年来，我约有一半岁月从事学校管理实践，担任过中学的班主任、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和校长，另一半岁月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管理与学校管理的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我深深感到，搞理论研究，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不尚空谈。联系什么实际，怎么联系实际，敢不敢说真话，是理论文章的生命所在。现在有不少中小学校长有志于当专家型校长、学者型校长，这是应该大大鼓励的。怎样才能成为专



家型、学者型校长？其中的关键是既要当好校长，又要真做学问，也就是要搞研究工作。作为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老兵，我愿意把怎么做学问的点滴体会，在“治学之道”这个题目下写出来，供现在的和将来的年轻校长参考。如果他们从中受到一点儿启发，感受到一点儿有益的东西，那我就很满足了。

当然，在“治学之道”这个大题目下，难免要涉及治校之道、为人之道、处世之道、交友之道，等等，但都与中小学管理和治学有点儿关系，同当代中国教育管理史有些联系。我希望能在这方面留下一点儿历史资料。

这就是我写“治学之道”的缘故。

治学之道与治校之道

治学，即做学问，做研究工作。治学有些什么“道”？一时很难说清。虽然教了几十年书，做了几十年学问，但要在一篇短文中对怎么治学说出个道道来，我实在无能为力。但我想，做学问总得回答一些问题，如做什么学问、怎样做学问、为什么做学问等。做研究工作，就得考虑研究什么问题，怎样进行研究，为什么研究。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写《学校管理学》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是个做学问的过程。我为什么要写《学校管理学》？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有现成答案：①研究学校管理，是我的专业；②出版社主动向我约稿；③此书已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但这本书怎么写却是最费脑筋的问题。我在该书第一版的《自序》中写道：“提起笔来，一系列难题出现在眼前：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概念很不统一，怎么论述？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正处在改革之中，尚无定论，如何阐述？国内已有多种这类专著，如果再出书而没有什么新意，岂非多余？”我着重考虑要有新意。怎么体现新意？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在写法上要有创新，要反映新成果，体现改革精神，立足于实用；每章后面要

有案例，供学员研讨；在论述各项具体工作的管理时，要强调规范管理。

写专著如此，写论文也是如此。写论文要选好题目，要有自己的见解，要经得起反驳，要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就是说，同样要体现新意。这算不算治学之道？我说不清楚。

治校，即管理学校。治校有些什么“道”？我虽然长期在中学工作过，当过多年的主任、校长，但要用简短的语言说出几条“治校之道”来，我也无能为力。学校管理者都知道，要管好学校，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治校之本。正确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怎样才算全面贯彻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内容：①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②改革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③加强和改善体育卫生工作；④发挥美育在学校中的作用；⑤重视劳动技术教育；⑥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⑦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紧密结合，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是指的上述内容。要谈“治校之道”，大概离不开上述内容。当然，还有治校方法、治校艺术。

治学之道与治校之道是什么关系？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根据我对一部分中小学校长的观察和个人的体会，我认为，治校必须治学，治学可促治校。治校而不治学的校长，必然无所作为；有所作为的校长，必然既治校，又治学。

苏霍姆林斯基是苏联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家，我国中小学校长对他并不陌生。他参加过卫国战争，负过伤，当过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29岁时被任命为一所农村七年制中学——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在他担任校长的22年中，他特别强调要用教育思想来领导学校。他有一句名言：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他在谈到怎样做学年度总

结时说：“对学校实行教育思想的领导，其规律就在于，我们必须经常把现在跟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分析，否则就很难工作。”他领导的帕夫雷什中学，被誉为世界教育实验的中心之一。由于他在教育事业上取得的杰出成就，苏联政府和人民十分尊敬他。1970年他逝世时，苏联全国下半旗致哀，以表示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一所农村中学的校长，为什么能在苏联和国际上享有盛誉？首先是因为他在治校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曾荣获乌克兰共和国功勋教师和劳动英雄称号。为什么他能在治校上取得非凡成就？因为他能在治校的同时辛勤治学。他既当校长，又当教师（教一个班俄文课），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曾跟踪观察和研究学生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期的各种表现并作详细记录。在学校管理问题上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一生著述甚多，写了41部专著，600多篇论文。主要代表作有《帕夫雷什中学》、《和青年校长的谈话》、《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等。其中《帕夫雷什中学》一书，是他对自己二十多年校长工作的总结，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他的著作，已译成多国文字。苏霍姆林斯基可以说是既治校又治学并取得极大成功的典范。

在我国的中小学校长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我在全国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工作多年，又曾参与主编湖北省《优秀中小学校长》一书，有机会接触不少中小学校长。我发现，许多优秀校长都是既治校又治学的能手。他们有独特的教育思想，有独到的办学见解，有很强的研究能力，把学校办得虎虎有生气，教学质量有口皆碑。我相信，作为校长，只要把治校和治学紧密结合起来，并取得优异成绩，就是专家型、学者型校长。